

中共北京党史人物传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第一卷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共北京党史人物传

第 一 卷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4年·北京

(京)新登字 07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共北京党史人物传 第一卷/中央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6

ISBN 7-80023-788-5

I. 中… I. 中… III. 中国共产党-人物-传记-北京 N. K820.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7891 号

中共北京党史人物传(第一卷)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 1929 信箱 邮编:10009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35 号

电话:(01)2581570 传真:(01)2581532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春雷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10 印张 200 千字

1994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 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 册

ISBN 7-80023-788-5/K · 730

定 价:8.80 元

《中共北京党史人物传》

编审委员会

主任	邵荣昌		
副主任	吴家林	黄景山	
委员	赵秀德	籍援朝	谢荫明
	陆兵	赵晋	

编辑部

主任	赵秀德		
编辑	赵晋	赵凡	
	江丽	郭小燕	

编 辑 说 明

一、为了记述北京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领导人和其他有关重要人物的活动，使他们为国为民牺牲奋斗的光辉业绩永垂青史，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决定编纂《中共北京党史人物传》丛书。党的活动是通过党的历史上的人物的活动来实现的。为党史人物立传，就是要把党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各项重要任务的完成，通过党史人物的生动具体的活动反映出来，就是要以革命前辈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和舍身忘死的生动事例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发扬他们的革命传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二、本书的收录范围，是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开始，在北京党史上有较大影响的人物。此外，本书还收录以下人物：(1)在北京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界有影响的人物；(2)在人民群众中有影响的英雄模范；(3)在北京有影响的党外爱国民主人士；(4)少数民族、归国华侨中的杰出人物。

本书收录的传主均已去世，健在的暂不收录。

三、立传内容，以传主在北京的活动为主，并以传主与党有联系的活动为主。

四、传稿文责自负。史实及政治问题，主要依靠作者自己从严把关。对明显失实之处或政治性错误，以及无关紧要的内容，编辑人员进行了必要的修改或删节。

五、各卷传稿的编排顺序根据收到稿件的时间先后依次排列，每一卷排名亦不分先后。

六、本书由赵秀德、赵晋主编。有不妥处，请广大读者不吝赐

教,以便在陆续出版的卷次中及时予以更正。

本卷由赵晋、赵秀德组稿选编,邵荣昌、吴家林审定。

中共北京党史人物传编辑部

1994年1月25日

目 录

李大钊	吴家林	赵秀德(1)
高君宇	袁钟秀	(57)
赵世炎	赵秀德	(87)
黄日葵	谢萌明	(108)
王定南	王宜春	赵 晋(122)
任国桢	段丽欣	(149)
李勃海	史建霞	(159)
白乙化	曹友林	(169)
徐智甫	张进军	徐振田(181)
李铁夫	河 山	(189)
聂 耳	刘 岳	(197)
蔡元培	梁 柱	(208)
张申府	孙墩恒	(236)
刘仙洲	唐纪明	(250)
陈 垣	刘乃和	(267)
时传祥	时纯利	罗忠敏(291)

李大钊

吴家林 赵秀德

中共中央为李大钊烈士撰写的碑文这样写道：“李大钊同志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大钊同志和其他无数先烈光荣地倒下去了，但是他们的牺牲没有使中国革命停止，相反，中国革命在牺牲者的血泊中继续前进，直至获得伟大的胜利。”^①

李大钊是中国知识分子中较早接触、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他努力在促进国共两党的合作，领导北方革命运动，注意在军队中扩大革命运动的影响，是一个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和革命家。他又是一名“具有高尚道德品格的学者”、著名教授。李大钊的学识渊博，人品极好。李大钊是我们共产党人、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的楷模。

一、家境与童年

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清光绪十五年十月六日），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

大黑坨村位于乐亭县城东南30华里，南距渤海约20华里，二滦河从村旁缓缓流过。该村始建于明永乐二年，即公元1404年，距今已有580年的历史。至清末民初，该村已发展为乐亭县东部沿海

^① 见《李大钊烈士碑文》，刊载《李大钊文集》上卷第6页。

地区较大村落，居民 250 余户，人口 1200 多人，全村共有土地 5700 亩：村里百分之六七十的土地集中于几户富户手中，而谷家和赵家是大黑坨村的望族。大黑坨村当时的景况，李星华曾作过具体描绘：一方面是自然景观很美。“每年一到春夏两季，成群结队的孩子们就到李家老坟的小树丛里串来串去，捉拿金牛、铜壳螂、老哇哇。端午节一到，那些大闺女、小媳妇们打扮得水花花的，从老远的地方来到李家老坟滚沙坨。”^① 另一方面是常遭水灾，常闹海盗，地主、恶霸、流氓，特别是“官府”，“他们把重重的灾难压在老百姓的头上，使得我们家的人们在旧时代陷入难以生存的悲惨境遇。”^②

李大钊是个“遗腹子”，又自幼丧母，孤苦伶仃，靠老祖父抚养成人。他的祖父李如珍，是个读书人，过继李大钊之父李任荣为子，继承祖业，不幸李任荣早年身亡。祖父把希望寄托在李大钊身上，对他很是宠爱，但管教非常严格。他家虽有薄田 90 亩，生活并不富裕。但祖父还是把李大钊送去读书。他从传统的观念出发，希望通过科举，光宗耀祖，扬名显宗。

李大钊乳名憨头，自幼勤学，3 岁开始认字。1896 年，祖父送他到附近黄瓜口村一位塾师单子鳌那里就读。这位老先生为他起名耆年，字寿昌。“耆年”是长寿的意思，因为老师喜欢他才给他起这个名字。他聪明好学。放学了，同学们都回家吃饭了，通常剩他一个人还坐在那里背书或默写，直到单老师催促他才离开学馆。他的学业进步很快，三年后，单老师对他爷爷说：“耆年这孩子学业良好，进步很快，我教不了他了，另请高明吧！”^③

李如珍到处奔走，为孙子选择良师。后来终于在小黑坨村张家学馆里找到赵辉斗老师，赵老师教他二年多，他又成为赵辉斗老师

① 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第 12、14 页。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 年版。

② 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第 12、14 页。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 年版。

③ 《李大钊史事综录》第 18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的得意门生。1901年，即李大钊13岁那年，他又转到乐亭城北井家坨村黄玉堂老师那里读书。由于李大钊的刻苦求学的精神和谦虚、朴实的品德，深受黄老师的夸奖。1903年农历腊月底，学馆年底结业，同学们等待放寒假。大家议论起清政府下诏变法，实行“新政”，引起了黄玉堂老师讲太平天国洪秀全“造反”的故事。李大钊一连向黄老师提出了好几个问题。太平天国主张有饭同吃，有衣同穿，“为啥还说他是造反呢？”“已备百万大军，占领17省，为何失败了？”李大钊最后很激动地说：“我长大要效法洪秀全。”^①正如他在《狱中自述》中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②。

1905年，李大钊到永平府去应试，虽然考中了秀才，但因科举停办，只好到永平府中学读书。这是一个洋学堂，在这里他接触到一些新思想，开阔了眼界。他勤奋不懈的读书，很少玩耍。课余时间他和知己的同学议论国家大事。他入学之初，又有日本与俄国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在中国的利益，在距离冀东不远的辽东半岛发生战争。清政府虽然宣布中立，但被屠杀、被掠夺的却是中国人民和土地。这一事件激发了李大钊的爱国热情，决心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他毅然将自己“李耆年，字寿昌”的名字，改为“李大钊，字守常”。“钊”字，即有“勉励”意思，又有“远”的意思。“守常”，即“持之不变”，看守、护守不变的意思。这表明，他要勉励自己，为实现自己远大的理想，拯救自己国家，永远奋斗下去。“其时祖父年逾八旬，只赖内人李赵氏在家服侍。不久，祖父弃世。”^③祖父李如珍是李大钊唯一的监护人，他扶养李大钊成人。李如珍考取过秀才，曾被授予“从九品”官衔（最低一级官吏品级），早年在东北长春、万宝山一带做过行商，家境好转后买了房产置了土

① 《李大钊史事综录》第20页。

② 见《李大钊文集》下卷第893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③ 见《李大钊文集》下卷第888页，人民出版社在1984年版。

地。至李大钊出生时，已有土地 90 亩，砖房 20 多间，当时在大黑坨也属于“富庶之家”了。当地有早婚的习俗。李大钊 11 岁那年，祖父便为他娶了邻村比他大 7 岁的姑娘赵纫兰做妻子。她为人贤慧热诚，正直朴实。祖父病时，由她服侍。在李大钊求学期间，独自持操家务，典当挪借，支持丈夫上学。^①

二、既忧国又忧民

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写道：“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家之良策”，“遂二三同学，乘暑假之便，赴天津报考学校。其时有三种学校正在招考：一系北洋军医学学校；一系长芦银行专修所；一系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军医非我所喜，故未报考。银行专修所我亦被考取，但理财致个人之富，亦殊违我素志，乃决心报考法政专门学校，幸被录取。”^②从以上文字看出，李大钊为什么要报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呢？因为“感于国势之危迫”，要求得挽救民族，奋振国家的好方法和好策略。至于理财的能使自己致富的银行工作，不是自己的志愿。至于军医是能治好军人、平民身体的病，不能治好社会的病、民族和国家的病（孙中山、鲁迅都有这样想法）。李大钊迫切需要“急思深研政理”。这个“政理”，可以作为“政治道理”、“政治理论”来解释。他急需求得一种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之中的理论和方案。

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是袁世凯创办的一所培养法律及行政管理人材的专门学校。专门科仿日本法律学校学制，6 年毕业。前 3 年是预科学习外语和中学的学科知识。后 3 年为正科，学习西方政治、法律课程。全部采用日语教学。“当时有两位日本教员，一系吉野作造，一系今井嘉幸，在本校当教授，后来两位归国都极力鼓

^① 见《李大钊史事综录》第 2 页，并参见《李大钊文集》下卷第 889 页。

^② 李大钊：《狱中自述》，见《李大钊文集》下卷第 888 页及其及注释。

吹平民主义、介绍民治思想，作民权运动”^①。李大钊受日本进步教授的影响不小，后来不止一次提到他们。李大钊熟练的掌握日语及英语，是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打下的基础。

1910年，“时当宣统二年，日本要强迫攫取安奉铁路，东省代表来津求援，天津学生在东马路开会欢迎，共举温世霖为会长。”^②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最活跃，他们同天津各学校3000多名学生在一起，举行了要求召开国会的请愿活动。李大钊被选为学生代表之一。他说：北洋法政学校学生在运动中分为两派，“一是立宪派，一是革命派”。“立宪派打算全体往北京请愿，要求政府开国会。本校同学在东大讲堂开会，同学秦户礼断指写血书，激扬民气。同学孙可君断肘，大家非常激烈。孙君断肘之后，全身为血所染，许多同学鼓掌叫唤，都以泪相见。”“那种悲惨激昂的光景，我终身不能忘！”“大家闹了一天，夜间开会，相约明天黎明整队到广东会馆开会作请愿的运动。”^③第二天学生们到了广东会馆，商议上府院请愿。天津各校校长及提学司前来劝阻无效，“到了府院衙门前都坐下，要求立时给北京打电报，使其立宪开国会，还要立时等回电。”后来“又整队往省议会去请愿，在道上碰见道台坐着马车，大家把道台打了个不亦乐乎，马车也碎了。”^④风潮闹完之后，当局方面以为风潮起的原因，都因为会长的鼓动，于是把温世霖放逐到新疆去，学校方面提出提前放假。

“这次风潮，算立宪派（大多数同学参加——笔者注）运动失败，而革命派进行越发有力，从此立宪派的人也倾向革命派”^⑤。革命派组织秘密团体，通过上海、香港报刊，对革命思想进行广泛介绍和传播。武昌首义爆发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地理教员白雅

① 李大钊：《十八年来之回顾》，见《李大钊文集》下卷第700页。

② 见《李大钊文集》下卷第698页。

③ 见《李大钊文集》下卷第699页。

④ 见李大钊：《十八年来之回顾》，《李大钊文集》下卷第699页。

⑤ 见《李大钊文集》下卷第700页。

雨，去滦州联络新军第二十镇举行起义。同白一块去的还有于永滋。但终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白雅雨壮烈牺牲。李大钊写道：“白先生平时很古板的，这时也作革命运动。滦州革命失败，同学以为白、于二先生不免于难，恶耗传来，大家悲伤得很，后来才知道白先生确乎身殉于难，于先生幸免。给白先生开追悼会，就在这个礼堂上。那追悼白先生挽联的字句，今天我来在这礼堂上，还仿佛有人念给我听！”^①李大钊平时对白先极为钦佩，白的壮烈牺牲使他多年怀念不已。

1912年秋天，北洋法政学会成立。并积极筹办学会刊物《言治》杂志。同年冬，为筹办《言治》杂志，李大钊曾赴北京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举办人之一孙洪伊接触。在京期间，他又会见了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的负责人陈翼龙，并加入中国社会党。次年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成立，李大钊任支部干事。

1913年4月，《言治》月刊正式创刊，先后共发行了6期。李大钊是北洋法政学会的编辑长，同时又是《言治》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他的早期论文及诗作约30多篇皆发表在《言治》月刊上。这些文章反映了这一时期他的思想、政治主张及政治倾向。1912年6月，李大钊撰写《隐忧篇》一文，反映了他对辛亥革命后成立的共和国表示隐隐约约的忧虑。李大钊原希望通过辛亥革命使中国能够“一力进于建设”，“隆我国运，俾巩固于金瓯”。但是，边患、兵忧、财困、食艰等等发生，因此“怅望前途，不寒而栗”。希望诸位君子、献谋献策，以解我忧。在《言治》创刊号上，李大钊发表了《大哀篇》，指出自共和以后，民政、民权都是少数人的，而“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所以“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②

1913年7月，李大钊自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赴北京，经孙洪伊的介绍，结交了汤化龙。孙、汤对李大钊很器重，愿意共同资助

① 见《李大钊文集》下卷第700页。

② 见《李大钊文集》上卷第4页。

他去日本留学。接着,李大钊由京回乡,筹划出国事宜。9月,他与同学子默等同游昌黎五峰山,正遇上日军在昌黎车站惨杀中国五名路警的事件。李大钊写道:“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中华领土,以戕我国土,伤心之士,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华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①。11月,李大钊临出国前,为了纪念友人郭厚庵(即天问)写了一首感时伤世的七律诗:

班生此去意何云,破碎神州日已曛。
去国徒深屈子恨,靖氛空说岳家军。
风尘河北音书断,戎马江南羽檄纷。
无限伤心劫后话,连天烽火独思君。^②

诗文表达了他对祖国命运的无限关怀和对朋友的思念之情。

1914年1月,李大钊从天津乘轮船东渡日本。途经黄海,他慷慨万分。他追忆写道:“曩者去国,航海东来,落日狂涛,一碧万顷,过黄海,望三韩故墟,追寻甲午复师之陈迹,渺不可睹”。“但闻怒潮哀咽,海水东流,若有殉国亡灵凄凄埋恨于其间者。”^③李大钊到了日本后,住进东京基督教会青年会中国留学生宿舍。不久,又参观“游就馆”(类似军事陈列馆)。馆里陈列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略战争时从我国掳去的所谓“战利品”。看着看着,李大钊的两眼就模糊起来,忍不住背过脸去,对着墙壁呜咽起来。他写道:“居东京,适游就馆,见其陈列虏夺之物,莫不标名志由,夸为国荣”。“人以纪其功,我以铭其耻;人以壮其气,我以痛其心”。“惟有背人咽泪,面壁吞声而已。”^④这一桩桩敲碎人心的事件,激励着李大钊爱国之心,使他感到挽救中华民族是迫在眉睫。

1914年9月8日,李大钊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本科

① 见《李大钊文集》上卷第87页。

② 见《李大钊文集》下卷第908、909页。

③ 见《李大钊文集》上卷第122页。

④ 见《李大钊文集》上卷第122页。

学习。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他刻苦攻读和吸收一切社会科学知识。在求学期间，他接触到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通过幸德秋水、安部矶雄等人的文章和著作，李大钊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经常和朋友谈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探讨宇宙及对人生的看法。但当时，他还没有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李大钊身在异国，然而却时时刻刻注意观察国内革命的动向。他的爱国主义和革命的民主主义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写了许多热情洋溢具有战斗精神的文章。他抨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揭露封建军阀的卖国行径，并组织神州学会，秘密进行反袁世凯的活动。

1915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袁世凯想做皇帝的急切心情，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与袁世凯进行交易。留日学生迅速召开留日学生总会，公推李大钊为文牍干事，起草通电，反对卖国条约。李大钊连夜草拟《敬告全国父老书》，呼吁全国人民一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袁世凯的卖国行径。李大钊写道：“中国者为吾四万万国民之中国”，“任何强敌，亦不能亡吾中国于吾四万万国民未死以前。”^①，这篇慷慨激昂的通电发出后，迅速传遍全国，推动了全国人民的反日爱国运动。但是，权欲熏心、一心想称帝的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逆历史潮流而动，决意于1915年5月9日接受日本灭亡中国的要求。

6月，李大钊编印《国耻纪念录》，发表《国民之薪胆》一文，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勾结，强行让中国接受“二十一条”的外交内幕，号召全国人民，以卧薪尝胆的精神，“勿灰心、勿短气，勿轻狂躁进，困心衡虑，蕴蓄其智勇深沉刚毅果敢之精神，磨炼其坚忍不拔百折不挠之志气”，努力奋斗，“前途正自辽远。光明缉熙之运，惟待吾民之意志造之，惟赖吾民之实力辟之。”^②为联系反袁斗争，开展反袁宣传，1916年1月，李大钊曾回国到上海。在赴上海途中

① 见《李大钊文集》上卷第123页。

② 见《李大钊文集》上卷第140页。

的轮船上作诗，题为《太平洋舟中咏感》。诗中有“八表正同昏，一夫终窃国；黯黯五彩旗，自兹少颜色”的句子，表明了李大钊已认识到袁世凯窃国称帝的本质。在此以前，他对袁世凯的认识不深刻，并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地方。此诗发表在次年4月1日出版的《言治》季刊第1期上。两周后，他又返回日本东京。2月2日，学校当局以“长期欠席”为理由，将他“除名”。从此，他离开早稻田大学，长期从事反日反袁的政治活动。在此期间，李大钊担任留日学总会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并主编《民彝》杂志。为了推进反袁斗争，李大钊于5月中旬毅然回国抵达上海结束了近三年的留学生活。5月19日，他在上海与故友白坚武“叙谈”。21日，他出席宪法研究会第一次集会。当时出席会议的有孙洪伊、王法勤、白坚武等10多人。李大钊回国后，立即参加了汤化龙、梁启超、孙洪伊等人组织的宪法研究会，并任汤化龙私人秘书。不久在政治上与这些人发生分歧，遂脱离了宪法研究会。

三、再造“青春中华”

1916年6月6日，当了83天短命皇帝的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咒骂声中离开人世。当晚，李大钊在上海与白坚武等“赴丹桂观剧，阅《新闻报》悉知袁死讯”。

当时，包括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先进人物，经过一度困惑后，认清袁世凯搞假共和的面貌。袁世凯的逝世，先进分子们异常兴奋，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给广大人民以自由、民主的共和国。1915年9月，由陈独秀等人发起，以《新青年》为阵地，开展了反对封建主义的新文化运动。这个文化运动，既是为辛亥革命的思想补课，又是为真正共和(国)奠定思想基础。这个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激烈地抨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主义旧观念、旧传统。李大钊在《民彝》创刊号上，发表的《民彝与政治》一文，就是他参加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作。该文以古今中外历史为依据，倡导“唯民主

义”和“立宪政治，反对“专制之政与君主之制”。文章特别指出：“今犹有敢播专制之余烬，起君主之篝火者，不问其为筹安之徒与复辟之辈，一律认为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而诛其人，火其书”^①。

7月11日，李大钊乘通州轮离沪北上。北行是应汤化龙、孙洪伊之约，赴京创办《晨钟报》，出任总编辑。报名“晨钟”是由李大钊起的。它的意思，是敲响晨钟，唤起人们特别是青年的觉醒，在创建“青春中华”的道路上不断迈进。8月15日，《晨钟》创刊号发行，李大钊发表了《晨钟之使命》、《新生命诞生之努力》两篇文章。《晨钟之使命》一文，申明创办《晨钟报》的使命，目的在于唤起民族之觉醒，激励青年，“急起直追”，“索我理想之中华”。他写道：“青年当努力为国家自重，《晨钟》当努力为青年自勉，而各以青春中华之创造力唯一之使命，此则《晨钟》出世之始，所当昭告于吾同胞之前矣。”^②由于研究系的插手，李大钊按自己的意愿办报的计划，没有能实现。他宁肯离开报社、失业，也绝不肯向旧势力妥协、低头。9月5日，他愤然离开他自己亲手创办的《晨钟报》，并发表启事：“《晨钟》创刊，鄙人承乏编辑主任一席。出版兼旬，缺谬未免，殊负阅者之雅望。今以私事萦扰，急思返里，爰请社中另托明达。”“所有编辑部事项，概不负责。特此声明。”^③

李大钊虽然离开《晨钟报》，但仍为创造“青春中华”而大声呼唤。9月，他所著的《青春》一文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此文系回国前在日本撰写，系统地表达了他对宇宙、对人生、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看法。这篇文章贯穿着朴素的唯物辩证观点和进化论的发展观；这是李大钊在这个时期的主导思想。第一，该文详细地论述了再创“青春中华”的历史必然性。他从物质世界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无限性的观点出发，坚信中国虽然目前十分衰弱，但进步是没止

① 见《李大钊文集》上卷第175页。

② 见《李大钊文集》上卷第182页。

③ 见《李大钊文集》上卷第217页。